

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红岩，是镶嵌在这座名城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岩，领导南方国统区广大共产党人和党外仁人志士，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牺牲在重庆歌乐山下军统集中营的英烈们，他们用生命与鲜血实践和光大了红岩精神，为中华民族塑造了一个个巨大而崇高的形象。岁月悠悠，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囚牢的阴霾早已扫除，但时光的流逝带不走红岩先烈的英名。他们在铁窗黑牢里用血肉之躯、钢铁意志与敌人的酷刑、屠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将不会被遗忘。「感先烈之功业，励后人之壮举」，红岩先烈所表现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将跨越时空，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身上绵延传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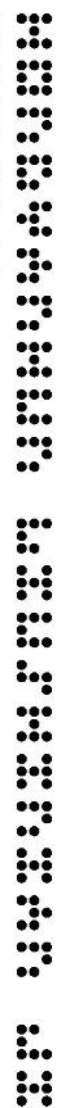
红岩魂六十年祭★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

主编：厉 华



红岩魂六十年祭★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

主编：历华

副主编：余远启 吴彦来 石强桢 黄小戎 傅俊弼 袁汝光 黄家玲
编委会成员：刘和平 卢苗 程廉 何燕 谭峥 陈浩 郭茜 杨晓朵 陈万英
杨明荣 罗蓓莉 刘洁 李红 黄卓 李华伟 赵毅 龚月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岩魂六十年祭 / 厉华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229-01406-3

I. ①红… II. ①厉… III. ①革命传统教育 中国
通俗读物 ②社会主义建设 成就 重庆市 IV. ①D642-49
②D61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0547 号

红岩魂六十年祭

HONGYANHUN LIUSHINIAN JI

厉 华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王怀龙 杨 帆

责任校对: 胡 琳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迪曦 唐莉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 240mm 1/16 印张: 25.75 字数: 967 千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ISBN 978-7-229-01406-3

定价: 30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六十周年祭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重庆,西北郊。

歌乐山翠霭深浓,遇风雨则万籁齐鸣,丛林清响,古人称之为歌乐山。

自1939年至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这里曾是中外特务倒行逆施的大本营;这里曾是关押、迫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人间魔窟;这里曾是人们谈虎色变的神秘禁区。

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以“躲避日机轰炸”为由,强征歌乐山下大量土地、民房,建“乡下办事处”。军统局的组织机构大肆扩大,特务职能大大加强,这里成了执行蒋介石“排除异己、打击进步”的一个罪恶基地!

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开始在歌乐山下建立秘密的集中营。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皖南事变的叶挺将军,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民革成员王白与,民盟盟员胡作霖等300多人先后被关押在这里!

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1949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此时,祖国的西南尚未解放,在重庆歌乐山下的集中营里仍关押着2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铁窗黑牢,它使每一个被关押者无比兴奋和万分喜悦,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获得了成功!走出监狱,获得新生,去拥抱大地,去亲吻红旗是每一个被关押者深深的愿望。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使得每一个被关押者心情沉重,敌人溃逃时的丧心病狂使他们感到死亡的逼近。面对胜利与死亡,革命者既昂扬奋达观又冷静观察,为祖国的解放,他们已做好最坏的准备。歌乐山的一草一木、抔土块石,牢牢地记下了反动统治者们失败时的丧心病狂,革命者在胜利到来前的潇洒大度、昂扬奋达观。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被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在人民的压力下,中华复兴社这个法西斯的秘密特务组织被解散,并入公开的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8月,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戴笠因资历不够,军统局局长一职名义上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兼任,戴笠升任为副局长,掌握实权。

军统局是蒋介石维护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谈到军统,不能不从戴笠说起。对于戴笠及军统组织起源的情况,陈立夫有评说如下:“军统之开始,是‘有实无名’的一个组织,由戴笠(雨衣)在蒋公侍从室工作的时候,受命担任调查特种事件开始的。当调查科发现戴笠在做类似的工作的时候,科中同仁愤愤不平,谓蒋公是否对我们不信任而另派戴笠去做?我就对科中同仁解释一番如下:‘我们的工作,可称之为党的耳目,你们看人身上耳与目都是成双的。所以党的耳目,亦不妨有两个,互相调查,是有益无损的。’众皆悦服。所以,戴笠的工作开始时是有实而无名的。”由此可见,戴笠与军统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者属于党,后者属于军,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但是,中统历来是由国民党的上层高官担任首领,故变选频繁,而军统则是戴笠一人独统,部属在极为严格的纪律规定下十分卖命,所以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而得以大肆发展。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军统局西迁重庆。戴笠利用军统特务活动的种种特权,在重庆扩大地盘、强化组织机构。他将重庆观音岩下的罗家湾警察训练所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又将枣子岚垭的“漱庐”作为军统局的接待室,又强行征购罗家湾19号和曾家岩50号房屋作为办公和宿舍区。1939年初,又以躲避日机轰炸为名,强征磁器口缫丝厂、五灵观、杨家山、钟家山一带房

屋,建军统“乡下办事处”。在重庆时期,戴笠极力扩大军统特务组织、强化特务职能手段,使军统局成为一个庞大的遍布全国的机构。

军统局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实行不同的活动方式。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破坏、渗透。军统局在陕西榆林、汉中专设有特务派遣组,不时向解放区派遣特务和阻留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胁迫他们当特务。1938年,张国焘从延安叛逃投靠军统,为军统提供中共的活动方式、组织工作、群众工作等情况,军统为其在重庆军统特区内成立了“中共问题研究所”。

在国统区,军统局实行严密控制、镇压屠杀。军统在交通、邮电、水陆、航空设立秘密检查控制站,对进步活动、进步人士进行秘密监视和打击镇压,对中共地下组织不停地进行侦察破坏,实行法西斯的统治。

在沦陷区,军统在南京、上海与汉奸汪精卫、周佛海秘密勾结合作,打击抗日的新四军,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进步人士。

“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局一切活动的根本原则。庞大的特务组织使军统局执行蒋介石反共政策有了坚实的基础。军统局人员最多时已超过5万名。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为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说,“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实际上蒋介石的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他认为,若没有像美国这样强有力的国家支援,中国的抗战是难以继续下去的。在五中全会上国民党还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要国民党以反共为中心任务而加紧组织的发展。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报告和讲话,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议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

会议还通过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宣誓后如违反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密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戴笠和他的军统局坚决执行蒋委员长的旨意,为提高破坏共产党组织,破坏进步力量,强化其特务活动的效率,开始了他庞大的特务训练计划。

特务训练班于1938年在湖南开办。戴笠本想把特训班纳入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但未获军事委员会批准,最后由蒋介石插手将军统训练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为“特训班”。军统对内反共反人民,消灭异己;对外勾结献媚,为蒋介石谋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专干那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在“特训班”内,戴笠生拉硬扯把“特训班”说成是黄埔军校的继续,把黄埔军校的校歌作为“特训班”的校歌。在重庆“特训班”期间,他命令修改歌词,重订班歌。歌词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卫护着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着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胆、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戴笠对“特训班”的特务以“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为标榜和号召,在内部刊印一本定期的名为《家风》的小册子来贯彻蒋介石“有共无我,有我无共”的反共思想。在实弹射击及野外战斗演习中,也是以共产党为假想敌,以培养受训特务对共产党的仇视心理。

1940年至1944年,是军统发展扩充最快的时期,仅这一个班训练的特务数量,远跟不上军统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在黔阳办第二期的同时,戴笠又在甘肃兰州另办了一个兰州特训班。这样还满足不了需要,从1942年起又在福建省建瓯开办了一个东南训练班。此外还在重庆办了一个渝训班,不过这个班的性质有别于以上的三个班,它是在重庆办的各种专业训练班的总称,包括参谋人员训练班、会计人员训练班、查缉干部训练班、外事人员训练班、南洋华侨训练班、电讯班、特种通讯班、爆破班、特种警卫人员训练班、国术班等等,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所有军统办的这些训练班究竟训练了多少特务,恐怕连军统局的训练处,也很难精确弄清。因为各个班每期在训练期间,都有大批人员调进调出。大致估计,在军统各种训练班受过训的人数,约在15000—20000。

1943年以后,由于军统与美帝勾结,双方议定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后便由美方出资、出教官和器材,与军统合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来训练武装特务,训练后并由美国提供武器装备。军统为了节缩开支,除电讯班外,息烽、兰州、东南三个训练班全部停办,改办中美班了。抗战胜利后,这一大批由美帝装备的武装特务,经军统报蒋介石批准,编入交通警察总局及所属各总队。

息烽特训班自1944年6月,除原特训班电讯系改称电讯班,仍归军统续办外,其余均改中美班。直到抗战胜利,中美合作所撤销,才全部结束离开了息烽。

军统重庆集中营

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和杨家山、黄家院子、红炉厂秘密囚室组成了庞大的军统集中营。中美合作所建立后,这里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禁区。出入要特别通行证,内部使用代金券,在区域内的人员一律佩戴特制的蓝底红字钢质圆形证章。歌乐山下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岗哨林立,电网密布,阴森恐怖,与世隔绝!原来的良田美土变成了特务住房和训练场所;自然的幽谷山泉、小桥溪涧

被插上了铁丝网并建起了岗楼。

1941年,李仲达、石作圣、冯鸿珊、陈河镇四名学生由璧山来渝,打算经三峡去解放区,途中误入磁器口“特区”而遭逮捕,关押长达八年,在1949年11月27日惨遭杀害。

歌乐山下的“神秘特区”,是一片丘陵起伏、广阔深远的山谷地带,横跨原重庆市区第13、14、17三个区,直径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华里。

军统局从在歌乐山下建“乡下办事处”到设立集中营,再到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先后修建了800多间房屋,并侵占了10余处住宅。现在保留下的旧址有:原中美合作所大营门;收发室;与外界隔绝的城墙;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住房;军统“四·一”大礼堂(现烈士墓);狼犬室;军统“四·一”图书馆;中美合作所总办公室;政训处;电台岚垭刑场;红炉厂秘密囚室;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杨家山秘密囚室;白公馆看守所;松林坡刑场;“戴公祠”(戴笠会客室、警卫室、戴公馆、停车场);气象台;军火库废墟;梅乐斯住宅——梅园;渣滓洞看守所。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经几十年的变化有的已不存在了,但我们可以从1979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了解“禁区”的情况:

“中美合作所的一条小型公路,是接连该所到磁器口的公路,这是该所与外界连接的交通要道。一进该所大门,就有两座石筑碉堡,碉堡上很多机枪孔,特务们就用机枪封锁大门。沿着碉堡又有一排依危岩筑成的高大城墙……

进入大门,眼前是一片修整得广阔平坦的大操场,操场尽头有一座检阅台。大操场左侧的土坡上,是蒋匪与美帝训练特务的大礼堂,……从操场往南,沿着山峦起伏的小径,走五六公里远便是电台岚垭,过去美帝在这里设有电台,……

沿公路进去是杨家山花园,这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这里的房屋建筑极为精致,屋前有宽大的停车场和美丽的花坛……

五灵观是中美合作所职员住的地方,内住了几十户人家。这里有一个内部供销社。现新建厂内原有打靶场,军鸽房、警犬室、马房都设在这一带。

黄泥磅一带(现新建厂医院和修小学的地方)原来是美国人的餐厅,洗澡塘,洗衣塘,还有大米加工厂。

红炉厂下面,现政法学院后面有几个院子和一些小房子,都是巡察队当官的住的地方。现部队内有一幢大房子是内二警驻地,小房子是住宿的地方。

蒋家院子旁边,有两幢库房,上面还有几座坟,埋的是国民党当官的大人物,还栽有松树。

杨家山下面有两个军火库,解放时被特务烧了。

进步云桥的左面有一幢房子(平房),是以卖纸烟为名作联系的,相当于联络站。

“四·一”医院原在里面,1947年迁到童家桥(现69中学),改为陪都医院。“四·一”印刷所也在那一带,这个地方原名洗布塘。

枣子堡(新建厂内)有一小学叫立人山小学,后被戴笠接收,改为雨农小学。

现政法学院内有一百多幢房屋,是特警班办公室、教室、寝室等。现煤店上有一片房屋是美国教官、翻译官住的地方。鱼塘只有现新建厂旁一个,当时还停有一只船,政法学院内鱼塘和外鱼塘都是后来政法学院和松山农场挖的。公路是从现烈士墓旁边进去,通汽车,汽车队就在右边(现鱼塘左面)几幢房子内。

汽车队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的。现公路至新建厂原来是小路,不通汽车。

特警班的办公室是现政法学院医务室,坐落在大礼堂(现烈士墓)右下侧,是一幢平房,有十多间,有主任办公室,政训组、教务组、总务组、会计科都在其间办公,现房屋面貌有些改动,前有石台、院坝。

我们在特警班,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活动。我们穿的是国民党黄军服,每个人配有一枚证章,发有通行证,如果需要进里面去,要办另外的通行证。

内没有电网、碉堡,只有警卫,特警班内有三个巡察队站岗,大门经常是三个人站岗,特警班办公室一人站岗,周围重要的地方都有站岗的。我没有来的时候,听说有两个学生走错路被关起来了。

我是高家镇人,民国三十二年到这个地方,经表叔介绍到“军委会”农场,不属“中美合作所”,我到农场喂猪。农场有三个,白公馆下面有一个,叫二区农场;渣滓洞有一个,叫三区农场。我们农场位于现在的新建厂(五灵观)。三个农场一共200多人,我们农场是军委会管。中美合作所范围在白公馆这面以现在化工厂的围墙为界,渣滓洞那边不能随便走。我们到农场穿灰衣服,有符号。红炉厂这面没有全部占,只是蒋家院子、黄家院子,黄家院子用作医院,蒋家院子是关人的。有美国人,现在展览馆后面一坡都是美国人住。白公馆一直是关人的,我们不能进去,白公馆周围有铁丝网,我们不发通行证,不能进去,白公馆那面的田都是农场经营的。

红炉厂这面农民可以走,办得有出入证,三百梯上面有岗哨。我们的符号是蓝颜色,上面的字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兵和夫是分开的,符号是注明了的。”

军统在为蒋介石诛除异己的活动中,非法逮捕、绑架了大量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士和各种“反蒋分子”。军统设立了许多秘密监狱、看守所和禁闭室。军统局迁到重庆后,这些监狱和看守所就相对集中分布在重庆和贵州一带,形成集中营的规模。在军统内部称这些监狱、看守所为“学校”,并根据它们的规模和关押“政治犯”案情的性质,又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

“小学”为设在重庆望龙门两湖会馆的望龙门看守所。在这里关押的人犯,大多属于案情较轻或尚在侦讯阶段的。一般关押时间较短暂,囚禁两三个月后,案情轻的,可能就“毕业”释放;案情较重的,即解押到军统重庆集中营的白公馆看守所和渣滓洞看守所,即“升中学”。

“中学”为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在“中学”关押的人,一般都是案情比较重大,或已经定案须监禁半年以上、三年以下的人。若须监禁三年以上,或案情重大,或案情复杂无法定案者,则要送到设在贵州省息烽县的息烽监狱,即所谓“升大学”。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白公馆便代之成为“大学”。

息烽监狱是1938年9月由湖南迁来,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军政部军法处南京军人监狱。息烽监狱是军统唯一用“监狱”命名的一所规模庞大的集中营。在这里,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分为八个斋,每个斋有六个以上的监房,关押的人被称为“修养人”。

在重庆歌乐山下,除白公馆、渣滓洞“两口活棺材”外,还有几处关押案情严重政治犯的秘密囚室,如关押杨虎城将军的杨家山秘密囚室,关押叶挺将军的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关押廖承志先生的黄家院子秘密囚室。

白公馆看守所 在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松林坡左下方,有一栋二层楼的西式建筑(修建时间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原是川军师长白驹为自己修建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认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后代,便附庸风雅以白居易的字号香山为名,刻“‘香山别墅’”于公馆正门之上,左右门柱上刻有“洛社风光闲适处,巴江云树望中收”的对联。这栋砖木结构的建筑,主楼背靠歌乐山,每层有五间房。厕所和厨房及附属房建在右边终年流水不断的山沟基石之上。附属房的底层有一个储藏食物的半地下室,左边由外到里有三间房,楼上只有二间。当地的人因其主人姓白,就称之为白公馆。

为了关押、审讯的保密,1939年秋,戴笠亲自到市郊选址并看中了白公馆。军统局把白公馆买下后,将它改为军统局特别看守所,存储食物的半地下室改为地牢,防空洞改为刑讯洞,其他房屋改为牢房。在白公馆内的墙上写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三民主义训练我们的思想”、“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言行”、“以三民主义规范我们的言行”、“自立、自觉、自制、自治”。第一任看守长是侯子川,以后分别是:濮齐伟、丁义质、张少云、丁敏之、郭文翰、张鹤。白公馆作为军统局特别看守所,在1943年前主要关押被军统认为的严重违纪分子和少数政治犯。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后,美方人员看中白公馆作住房。于是,戴笠命军统局重选地方迁移看守所。

1944年,白公馆辟为美方来华人员第三招待所,白公馆被关押人员迁到渣滓洞。1945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后,白公馆曾又作为关押汉奸周佛海等人的地方。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后,所有被关押的“人犯”迁移到白公馆关押。白公馆又重新作为保密局的特别看守所。

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属案情严重的。为了保密起见,原大门关闭不使用,在左边的围墙处开一小门供进出,另靠围墙建了三间平房作警卫室,还建了一间小房作传达室。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小萝卜头宋振中和他的父母——西北特支党员宋绮云和徐林侠,民革党员周从化和黎又霖,共产党员刘国鋳、谭沈明、陈然、丁地平、许建业,新四军战士文泽,杨虎城将军卫士阎继明和张醒民,学生石作圣和陈河镇等先后在此被关押并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从白公馆脱险的罗广斌1949年12月25日向重庆市委递交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白宫’(指白公馆)原是关特务的,后来把政治犯也关在一起了。书较多,什么都有。看书要登记,以检查思想,但大家仍选自己高兴的书看。监视也较严,没法进行集体学习,只能个别读书,陈然专修生物、化学、数学、军事科学和历史,刘国鋳专修历史,王朴读历史和军事科学。坐牢九年的老同志(党员)许晓轩、谭沈明在狱中专修英语、俄文,十分精通了,一般书籍几乎全读过,在修养上也最好,连特务都尊敬他们。难友们曾说:‘如果出去,老许、老谭当然领队!’在白宫楼上,和谈(1949年4月)以前已经可以通过黄显声将军(张学良手下副军长)秘密看报,那时楼上住的陈然、邓兴丰。我们三人便抄发消息,出版了《挺进报》白宫版,经常在看守人员不注意时给楼下角落里住的王振华夫妇,转给王朴、刘国鋳,再转给许、谭及各难友。最后,一份七届二中全会的宣言,许交

给另一位难友看,被发现了,事情十分严重,是极可能因而枪毙一两个人,而且牵连起来,整个监狱都有关系。陈然想自己去承认,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是许晓轩站出来承认是他写的,从弃报(垃圾中的)上抄的,对笔迹也像了,于是钉上十几斤的重镣,关重禁闭,饿三天饭再罚苦工。老许的沉着、英勇那一次充分表现出来了。他的被害,不能不说是革命阵营的严重损失。

从今春起,对特务的教育、争取工作就开始了,这中间陈然是付了很大的劳力的。到十一月,六个看守员中有五个都接了头的,其中杨钦典、安文芳,是由陈然、冯鸿珊和我负主要的教育责任;刘国鋳对付宋惠宽、王子民;王振华对付王发桂。除了王子民外,其余四个收到了很大的效果。目前杨钦典、宋惠宽、王发桂都还留在重庆,安文芳已参加公安部工作。当屠杀在进行中,我们能从杨钦典手中得到牢门的钥匙和一把铁锤,就是由教育争取所得到的一点收获。

在教育争取特务的同时,就是准备在狱中的暴动,用自己的力量冲出去。后来大家知道,解放军到临前夕,屠杀恐怕是免不了的。解放军到得早便杀得早,到得晚便杀得晚,只有用自己的力量解放,才较安全。研究、设计这问题的主要是许、谭。到王朴、陈然牺牲后,周从化、刘国鋳我们五人共同研究,认为冲出白公馆,首先解除管理人员的武器较易,但与白宫周围的警卫连作战便很困难了,尤其单解放白宫是不行的,渣滓洞的难友一定会被当做人质而全体枪决(从前特务丁敏之任西安集中营所长时,政治犯几百人跑了,戴笠便立刻到息烽去杀了七个共产党员,以目前情况说,当然更是严重)。以白公馆的三四十个政治犯,冲出白公馆,击败警卫之后,还要去担负解放渣滓洞的任务,那是决不可能的。原来,一九四八年春李子柏(抗大的,精通游击战术)由白公馆移渣滓洞时,谭沈明也告诉过他策动打监,但两处得不到联系,单独行动,尤其在白宫是不能够的,突围的计划,就终究没有实现。”

在抗战后又重新作为特别看守所的白公馆,关押的都是一些没有刑期的政治犯。长期囚禁,消磨意志,促成转变是特务试图达到的目的。在这里,设有图书室,被关押的政治犯可以在自己的楼层走动,家属可以送东西进来,政治犯也可以自己出钱由看守买一些食物回来。但是,这些“优惠”的条件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图书室成为政治犯自己学习钻研的地方;楼层成为政治犯秘密联络、交换情况的主要场所;带东西和买食物成为政治犯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的途径。在狱中,政治犯反改造斗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教育、争取特务看守。当时的看守特务大多数是出身于贫苦的农村家庭,在看守所面对政治犯的言谈举止使他们有的从恐惧的心理中走出来,而以常人的心态去接触他们。看守杨钦典在“11·27”烈士殉难50周年的时候在白公馆详细回忆了当年的一些事情:

问:你是怎样到白公馆的?

杨:我是被蒋介石要家乡兵的时候到部队的。当了兵后,人家见我没有文化,就叫我到军委会去站岗。后来军统要一些可靠的兵去看押政治犯,1948年我就被抽调到白公馆。刚去的时候我是很怕这些政治犯的,因为当官的对我们说过,这些人都是坏人,没有人性,连人都敢吃!我就仔细地观察他们,想知道这些年纪轻轻的人究竟怎样的厉害!有一次,陈然坐在栏杆下,我从他身边路过,听见他小声地说:在家种过地吗?父母还好吗?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很纳闷地看着他在想:怎么这些共产党员也知道种地,也知道孝敬父母?以后他就主动地与我讲话,说他看得出我也是一个穷人。虽然他讲的话我不是都听得懂,但是我看他不是那种连人都要吃的坏人!陈然、罗广斌这些人特好,有骨气,是真正的男子汉!怎么整他们,就是不跟特务配合,我是从心里佩服他们……

问:你当时放走罗广斌他们是怎么想的?

杨:那天其他的人都被抽到渣滓洞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白公馆里面。我听见罗广斌在喊我:杨先生、杨先生!我听见了就走到他的牢房门口。罗广斌跟我说:杨先生,我们知道你也是穷苦人,我们这些人为了穷苦人的翻身被国民党关在这里。重庆马上就要被解放军共产党解放了。你如果能够把牢门打开让我们跑出去,今后我们给你证明:你是个好人的,而且一定安排你回家去!我跟罗广斌说:你让我想想再说。我当时很想回家,可是看守所一直就不准回家。我对罗广斌他们很同情,他们平时讲的那些话我也十分爱听,他们平时相互关心照顾,非常的热情,他们在我的印象中不是坏人。我当时心里面一横就对罗广斌说:我开了门后你们不要动,我到楼上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你们听见我在上面跺三下脚,你们自己就跑吧!

对于杨钦典的这个说法,罗广斌在他的《报告》中的“人物”一段也有记载:

“杨钦典:特务,参加军统已七八年,当兵出身,由于个性强,不愿做坏事,到现在还是上士。他与黄显声、陈然、我、李荫枫很熟。今春蒋介石‘引退’后,陈然、邓兴丰、我住在楼上,有较多机会和管理人员接近,便开始澄清个别特务脑中的毒素。黄显声也参加这一说服、教育工作。四月,一个特务小周,经过改造,终于请长假到湖南了。剩下的杨钦典与我们处得最好。陈然牺牲后,他对我说:‘小罗,你要软一点,如果徐远举问你,你不要太硬了。以后,要好好照顾陈然母亲、妹妹。’屠杀前,他告诉黄显声说,局势很紧

张,你最好逃跑,我可以和你一路。而且杨能找到一张路条,警卫他也认得,黄逃跑,是很可能成功的。但黄坚信特务头子周养浩(霞民)的保证——不会杀他——死也不愿走。当天执行黄的便是杨进兴和杨钦典。杨钦典后来告诉我说:‘真急死人啦,他硬不走,结果糟了。’他说,执行时他的枪没有拿出来,是杨进兴打的。从他和黄的感情说,这有可能,但就是他打的,也不是出于自愿,是被迫——否则他自己被枪毙。他又说,他之所以拿了钥匙给我,主要是想我和李荫枫出来,其他的人,他是不关心的。这是很坦白的話,除了我们长期与他相处外,李荫枫也收买他。杨很简单,总说李是好人。据他说,执行石作圣、李仲达的是王发桂(也是经过教育的管理员),王开枪没有瞄准,打了许多枪,但都没有打在身上,又是晚上,只要不开腔,胡乱埋起来会活出来的,但李仲达高喊:‘再补一枪’(可能是受了伤)。杨进兴跑过来把他们都打死了。王后来气急败坏地对他讲,心里非常难过。杨到牢门口讲屠杀情形时,眼眶也充满了泪,十分痛苦,后来拿了铁锤和钥匙给我,约定在楼上用脚踩三下,便是警卫撤走了,过五分钟我们便可以逃出。杨后来自己也逃出了特务圈子(原来他打算和我们一道跑的),目前住在临江门介中公寓。他虽在特务中很久,但地位太低,能力也差,除了白公馆外,他知道的材料很少,不可能供给太多的情况。他自己听从了陈然的话,希望回河南作一个农民。这需要给他一个证明和发给旅费,算是根据‘立功者奖’的原则对一个改过自新的特务的奖励。”

白公馆看守所在重庆解放后,又作为西南公安部的第二看守所,徐远举、周养浩、王陵基、宋希谦等特务、战犯在此被关押。到1951年6月松山收审所建好后,才将战犯转移过去。

渣滓洞看守所是资本家程尔昌开办的一个小煤窑,因开采出的煤矸石多,煤炭少,故被当地人称之为“渣滓洞”。1944年,军统局侵占煤窑,将此地改设为看守所,关押白公馆迁移来的政治犯。1946年政治犯迁回白公馆后,这里曾关闭了一段时间。1947年又开始关押政治犯,隶属重庆行辕。关押的政治犯主要是《“挺进报”》案件被捕人员,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被捕人员,“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教育界、新闻界等人员。

渣滓洞分内外两个院子。外院是特务办公和审讯的地方,有所长的办公室、审讯室,还有一个简陋的医务室,在外院的墙上写有警示特务看守的训词:“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和国民党党员守则。外院的审讯室里有施行各种刑罚的刑具:老虎凳刑、吊刑、火刑、电刑刑具等。

内院有一楼一底的房屋十六间和三间平房,有两间平房是关押女政治犯的。在关押政治犯的内院墙上也写有用来软化革命者的标语:“青春一去不复返,还须细细想想,认清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忧”,“政府痛惜你们背道而去,极望你们转头归来”。

相对于白公馆,渣滓洞的管理比较严格。被关押进看守所的人要被搜身除物,登记编号,早晚各有放风时间,平时不能出监舍。

罗广斌在《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九四八年八月,关在白宫的叛徒白佑生,被调往渣滓洞作上尉训练组长(所长李磊,少校;管理组长徐贵林,上尉)。他呈报二处成立青年感训大队,想把六一被捕的加以‘教育’。(‘青春一去不复返,还须细细想想,认清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之类的标语口号就是那时搞的。)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四军士兵龙光章(合川人)病死了,他们十一个人被捕,送到渣滓洞时已拖死了六个。他死了,牢里空气很沉重,每一个难友都觉得生命毫无保障,连应有的医药都没有,因此发动绝食要求追悼。所方终于认识了这种力量,而且让了步,买了棺木,放火炮,正式开追悼会,由所长主祭,全体难友陪祭。在最困难的集中营里,这次斗争是相当成功的。难友写出了许多用草纸做的挽联,还有黑纱、纸花,充分表现了灵活的创造性和团结的斗争精神。‘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就是那次的挽联之一。

新年以前,听说李文祥叛变,各室开了检讨会,又大量写出慰问函件、诗、文给李妻熊咏辉,鼓励她、支持她。后来她明确表示不会叛变,而且以后要和李离婚。一方面是熊的坚持,另一方面,集体打气,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新年,又是一次灵活的斗争场面。球赛时,队员穿着绣有‘自由’二字的背心。各室利用放风的机会表演节目。早上全体唱歌——《正气歌》(各室预先约定)。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是彭咏梧同志死难的周年纪念日,各室当天停止娱乐,开了追悼会,传观了许多纪念作品,最后向江竹筠致敬。江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①被捕前的总结;②被捕时的案情应付;③狱中学习情形。每项有详细的提纲,后来各室分别酌量进行了讨论。不久,蒋引退,局势好转,各室的学习便展开了。陈丹墀等在这里面起了相当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接着教育收

买了个别管理员,渣滓洞的名单因此带出来了(后来有人寄名单到香港,顾建平因此被捕)。后来组织上的医药也带到集中营了。”

渣滓洞看守所在 1949 年“11·27”大屠杀后被烧毁。现在的建筑是根据脱险同志的回忆,按照原样式重新复原修建的。

白公馆、渣滓洞是两口活棺材,是人间地狱。被誉为“黑牢诗人”的蔡梦慰在他的《黑牢诗篇》中,对两口活棺材作了形象的描述:

手掌般大的一块地坝,
箩筛般大的一块天;
二百多个不屈服的人,
铜禁在这高墙的小圈里面,
一把将军锁,
把世界分隔为两边。
空气呵,
日光呵,
水呵……
成为有限度的给予。
人,被当作牲畜,
长年的关在阴湿的小屋里。
……
墙,这么样高!
枪和刺刀构成密密的网。
热铁烙在胸脯上,
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
用凉水来灌鼻孔,
用电流通过全身……
“老虎凳”、“鸭儿浮水”……
“水葫芦”、“飞机下蛋”……
多么别致而又丰富的字眼呀,
在它们的辞典上,
是对付反抗者的工具,
是赏心乐意的游戏。

秘密囚室

杨家山秘密囚室 在中美合作所军统集中营特区内,除白公馆、渣滓洞两座臭名昭著的监狱外,尚有许多处秘密囚室,一般只囚一人,由重兵把守,对外名曰将官休养所,以掩人耳目。西安事变发动者之一——杨虎城将军就曾在杨家山秘密囚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悲惨的岁月。1949 年 8 月,蒋介石偕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指示毛人凤将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政治犯择重要者杀掉一批。当毛人凤请示是否将杨虎城押送台湾时,他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留下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他对毛人凤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转变过来吗?只有杀掉。”

9 月 6 日,杨虎城将军与他的儿子拯中、女儿拯贵和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一起从贵州被押往重庆。当天晚上在军统集中营的戴公祠被秘密杀害!

蒋家院子秘密囚室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 9000 余人,从安徽泾县云岭北移,6 日行进到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 7 个师、8 万余人的突然袭击。我军历时 7 个昼夜浴血奋战,除 2000 多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

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7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在电话中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是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当晚,他以沉痛的心情,挥毫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18日的《新华日报》上。

叶挺将军先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后又转囚在磁器口军统集中营的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在狱中他写下了《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是被囚禁在集中营的革命者人格、尊严、价值的写照。《囚歌》写成后,由叶夫人李秀文带出交给郭沫若,这首被郭誉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后来在社会上广泛传诵。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等政治犯的要求。1946年1月8日政协会议召开,蒋介石虽在开会词中许下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等几项诺言,然对是否释放叶挺,一直不肯表态。3月,我党再次提出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国民党始同意释放叶挺。3月4日,叶挺获得自由。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入党申请。3月7日,党中央复电同意了叶挺的请求,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电文写道: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之忱。”

4月8日,叶挺与夫人、扬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由重庆乘机飞往延安,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因飞机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将星陨落,苍天生恨,山河同悲。

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

黄家院子秘密囚室 1942年5月,由于叛徒郭潜出卖,廖承志在广东乐昌被中统特务秘密逮捕,投入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此为廖承志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第七次被捕。

1945年1月,蒋电令江西省主席曹浩森,嘱曹转知军统江西站站长邓树勋,将廖用飞机押解重庆,自此,廖承志落入军统之手。到重庆后,立即被投进渣滓洞监狱,在狱中,每天都在牢房门口高唱《国际歌》,看守禁止不得,又害怕引起骚动,几天以后,将他转到离白公馆约一华里的黄家院子秘密囚室单独囚禁。外层由交警巡察总队两个排的兵力看守。国共重庆谈判时,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等人的要求,政协会议上蒋也许诺释放政治犯,种种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释放廖承志。

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获释,成为抗战胜利后获得自由的第一人。

歌乐山的记录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几次到重庆部署大破坏、大屠杀、大潜伏的计划。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面临全面大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曾训斥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蒋介石要求保密局在对关押的政治犯实施屠杀

时不能讲情面！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保密局要求迅速清理“积案”，将所有在押人员造册上报，择其“要犯”实施公开和秘密枪杀。

1949年10月28日，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命令重庆警备司令部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押出陈然、成善谋等10人，在国民党军事法庭审理后，押往大坪刑场公开枪杀。

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押出江竹筠、李青林、陈以文等30人，在歌乐山下的电台岚垭刑场秘密枪杀。

1949年11月26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下达了对渣滓洞看守所革命志士进行屠杀的名单；向保密局法官、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下达了经过蒋介石批准的对白公馆看守所的革命志士进行屠杀的名单。

1949年11月27日上午，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的办公室里，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站法官、西南特区第二科科长龙学渊，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渝组组长、二课课长雷天元，行动组长熊祥，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接受了徐远举的任务布置。徐远举决定：渣滓洞屠杀由雷天元、龙学渊主持，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并要求将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人犯”押到渣滓洞一起枪杀。下午4点，雷天元、龙学渊带熊祥、李磊、徐贵林到歌乐山下的保密局公产管理组副组长张秉午家中商量分批屠杀的办法。

晚上8点过开始，渣滓洞看守组长李福祥拿着名单，将刘石泉、邓惠中等24人分三批押出，由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第五连连长宋朝贵带兵押往松林坡枪杀！

在渣滓洞的革命者被押往松林坡枪杀的同时，雷天元也带人将寄押于白公馆的刘国鈺、周均时等分批提出枪杀。11点多钟时，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里徐远举命令雷天元必须在28日天亮前完成屠杀任务，警卫部队也要全部返回。原来，徐远举得到情报：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重庆的南泉了。惊恐万分的雷天元立即带着特务们到了渣滓洞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办公室里，雷天元命令将所有未决的“人犯”全部集中关押在楼下的牢房中，用卡宾枪进行扫射，用最快的方式进行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副所长徐贵林在解放后的交待材料中，交待了当时的情况：

“11月27日半夜，雷匪天元及龙匪学渊、熊祥、王少山同特区派来的五人到渣滓洞来，由李磊交给我一张纸条，叫我提出俩人后，当时由雷匪天元将他二人送出所外放走的，雷匪回来后就向李磊说，因时间的关系对他们就在房内处理，将房子烧了要快些……。当时由雷、龙俩匪与李磊出有字据，后才叫卫兵连宋连长来商讨，叫他派10余人带冲锋枪杀害后，另外叫他派兵放火。当时李磊叫我带着李福祥、余相北、唐友元去将楼上60余人调到楼下各房间内来，调完我就去整理行李。由龙匪学渊带来的熊祥等人及卫兵连派的段排长带来的兵10余名，同到各房门口去枪杀，由段排长用哨音指挥统一行动，鸣枪有数分钟后，由熊祥来叫我，他说恐怕有的人没有打到，叫我将各房的门打开，当时我就吹哨子集合看守人等去开门后，我同看守及龙匪带来的人分别到各房内去检查并补枪后，李磊和我们带着行李到煤厂门前集合，后由卫兵连派兵将所内的房子及所外的兵房一同放火烧起……”

渣滓洞大屠杀完毕后，28日凌晨，雷天元带领龙学渊等回到市区，到二处向徐远举复命。根据徐远举的命令，雷天元等又将关押于二处的政治犯枪杀。保密局西南特区对雷天元等各发100元奖金嘉奖。在成都解放前，雷天元、熊祥、龙学渊、王少山等被徐远举送去了台湾。

1949年11月26日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召集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商议分批屠杀计划。27日，陆景清将分批屠杀计划带到市区向毛人凤汇报并得到批准。下午，陆景清回到歌乐山，打电话给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要他立即按计划执行屠杀。

第一批由杨进兴和看守员杨钦典枪杀黄显声、李英毅；

第二批由杨进兴、安文芳枪杀刘笃一、白银山；

第三批由看守员宋惠宽、程遂愿枪杀何仲甫、陈为诚；

第四批由杨进兴、王发桂、王子民枪杀奇丕章、张碧天；

第五批由杨进兴、程遂愿、王发桂枪杀王振华、黎洁霜和小孩王小华、王幼华；

第六批由杨进兴、王发桂、宋惠宽、程遂愿枪杀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和谭沈明；

第七批由杨进兴、宋惠宽等枪杀宣灏、许晓轩、文泽、陈河镇。

在白公馆分批屠杀的时候，雷天元等人分两次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刘国鈺、熊世政、丁地平、谭谟、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等提出，与渣滓洞提出的政治犯一起在松林坡枪杀，其中谭谟身中三枪未死，后从尸堆中爬出得以生还。在第

二次雷天元来白公馆提人的时候,他打电话与徐远举核对名单后,要白公馆将二处留下的人集中在一起。

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奉命将保密局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人犯全部处理完后,便立即赶回到市区向保密局交差。杨进兴按雷天元的要求,命杨钦典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十几个未决人犯集中关押到楼下右边二号牢房,并打电话给渣滓洞要二处赶紧来人解决。参加屠杀的特务人员每人得到二钱黄金和二块银元的奖励后,自行遣散,各谋生路,只留下杨钦典和李育生暂时看管未决人犯。对当时情形,杨钦典回忆道:

“1949年11月27日中午,所长陆景清开会,下午所有人员不准离开白公馆,下午两点钟,看守长杨进兴带张学良部下的军长黄显声、副官李英毅到步云桥枪杀了。下午六点钟,杨进兴又拿着点名册点了六人,喊我开牢门,拉到白公馆外600公尺远的地方枪杀了,是管理组执行的。又在当晚七点钟,杨进兴又拉出去六人仍在离白公馆600公尺远的地方枪杀了,他们上午提前挖好坑,这十二人的尸首全部埋在里面,那时我当班,所以我开的牢门,后来剩下罗广斌等十八人集中在白公馆的一个牢房,我问杨进兴怎么办,杨答应说:这十八人由西南长官公署来处理(即渣滓洞来处理),他们不管。等到晚上十一点钟,白公馆办公室所有的人一个不见,都跑了。罗广斌问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把门开了我们走,我答应说,我到楼上去看,如果楼上无人,我就跺三下脚,你们就走,不要一起走,要各走各的。这十八人就是这样放走的。”

杨钦典是白公馆罗广斌等十几个人脱险的见证人。1998年5月,《红岩魂》展览在河南洛河市展出,我们的解说员在当地的一个记者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年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展览结束后,我们从河南请来了杨钦典。他虽然是已近80岁的老人,但他对自己的经历仍然非常清楚,1998年6月11日我在办公室对他作了采访,他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些情况:

问:你老家是河南什么地方?

答:我家住河南洛河郾城县周庄村。1942年在胡宗南部队当士兵。1943年我们这个连开到重庆编为交通警备队,主要任务是站岗、保卫。

问:你有什么职务吗?

答:1946年当班长,1948年6月在罗家湾看仓库时将我们这个班调到白公馆站岗,我仍然任班长职务。因为蒋介石专门找的我们河南人。

问:你还能够给我谈一谈当时白公馆里的情况吗?

答:那个陈然可真是勇敢,特务问他的时候他说得敌人无话可说。敌人问他印报的东西是哪来的?他说:我自己编的,我自己印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最后,特务是把他加上重镣关起来的。那个罗广斌也很厉害,特务把他家里的人叫来劝他,让他写一个交代就把他交给他的哥哥罗广文,可是他就是说:我没有什么罪,写什么?

问:罗广斌他们十几个人当时关在一起,为什么杨进兴不杀呢?

答:那不是他的事,罗广斌这十几个人是徐远举那个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杨进兴他只能杀白公馆的人。当时,那么的混乱,谁还愿意帮谁的忙呢?

问:大屠杀后你到哪里去了呢?

答:罗广斌他们跑出去了后,我就带着全班的弟兄坐着卡车进城了。我到了李荫枫的家里去住了一夜。解放后,李荫枫带我到脱险处去,见到了罗广斌他们,他们说还在找我,他们把我安排在招待所里住下。那时他们要我参加工作,但我接到家信要我回家。我17岁就离家考到胡宗南的教导团去了。我提出回家的要求后,政府同意出证明,我就回到河南老家去了。

面对死亡——发生在重庆解放前歌乐山下的大屠杀,始于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一家和小萝卜头一家在松林坡被害;终于1949年11月29日,30多名革命志士由市中区转押到松林坡杀害。其中最残酷惨烈的是11月27日(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即将溃逃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歌乐山下的步云桥、白公馆、松林坡、梅园、渣滓洞,对手无寸铁、戴着脚镣、手铐的2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志士、青年学生、军人、小孩乃至未满周岁的婴儿,实行分批、集体的大屠杀!有的殉难者是在听到了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炮声后倒下去的!

新中国已经成立,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成为了现实。在这胜利来临的时候,革命者面临的是敌人的垂死挣扎,他们所遭受的是特务溃逃时丧心病狂的秘密屠杀。此时此刻,每个被关押者的心情是怎样的?他们又是如何面对这死神的降临呢?

在保存的烈士遗书、遗信、遗诗中,有一部分是在大屠杀开始后写的。因皖南事变被捕的新四军宣传干部文泽,在白公馆目睹一批又一批的战友、同志被押往刑场杀害,他怀着愤怒的心情提笔写诗,记录下了大屠杀时的一些真实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革命志士面对死亡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开始后,文泽写下了《天快亮的行凶》。这首诗由白公馆脱险同志藏在鞋里带出来得以保存。

“黑夜是一张丑恶的脸孔，
惨白的电灯光笑得像死一样冷酷。
突然，一只粗笨的魔手，
把他从恶梦中提出。
瞪着两只大眼，定一定神，
他向前凝望：
一张卑鄙得意的笑脸，
遮断了思路。
立刻，他明白了，
是轮次了，兄弟，不要颤抖，
大踏步跨出号门——
他的嘴裂开，轻蔑地笑笑：
‘呵，多么拙笨的蠢事，
在革命者的面前，
死亡的威胁是多么的无力……’
记着，这笔血债，
弟兄们一定清算：记住，血仇。
呵，兄弟，我们走吧，
狗们的死就在明朝！
血永远写着殉难者的‘罪状’——
第一：他逃出了军阀、土豪、剥削者的黑土；
第二：他逃脱了旧社会屠场的骗诈、饥饿；
第三：他恨煞了尘世的麻痹、冷漠、诬害；
第四：他打碎了强盗、太监、家奴、恶狗加给祖国的枷锁；
第五：他走上了真理的道路，向一切被迫害、被愚弄的良心摇动了反抗的大旗……
呵，兄弟，你走着吧！勇敢地走吧！
呵，兄弟，记住我们的战斗信条：
假如是必要，你就迎上仇敌的刺刀，
但是真理必定来到，这块污土就要燃烧。
刽子手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冷笑。
一转身，他去了。
呵，兄弟，
不要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呵，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颤栗、恐慌，
他们要泄忿、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
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
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
血仇要用血来报！”

写完这首诗几个小时后,文泽就被特务拉出白公馆枪杀,殉难时 31 岁。死亡逼近!他能以如此冷静的态度来书写生命最后的遗言,可见他对死亡的无所畏惧。诗的结尾显得突然,似乎没有把话讲完,特务的脚步声就急急地赶来了。“死亡的威胁是多么的无力”,这是革命者内心坦荡自如的真实写照;“假如是必要,你就迎上仇敌的刺刀”,这是革命者在生与死面前的勇敢选择。

面对死亡,革命者无怨!

面对死亡,革命者无悔!

年仅 21 岁的黄细亚烈士,生前在《一个微笑》的诗中写出了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追求和选择。

“.....

用你笔的斧头,
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以你诗的镰刀,
去收割人类的幸福。
牢记着吧,诗人!
在凯旋的号声里,
我们将会交换
一个微笑.....”

在狱中被誉为“大众诗人”的古承铄烈士,在狱中写的《宣誓》一诗,表达了革命者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

我宣誓——
我是真理的信徒,
我是正义的战士,
我要永远永远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面对死亡,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从我们保存的烈士在狱中的遗信、遗诗可以感悟出革命烈士在面对死亡时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朱世君烈士在狱中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哥哥:

请你放心。我已经作好思想准备。他们要我交出同伙,特别是化文,以及我所有活动。我什么也没有说。真金不怕火烧,巾幗不畏严刑。我什么也没有说。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手段,永远也莫想在我身上有所得!我多么盼望你来看我!但又不愿你来,因为他们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最后,希望你继续我们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陈用舒烈士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四首诗:

—

铁打英雄胆,
不怕牢坐穿;
一心为人民,
革命意志坚。

二

我若被虎伤，
脸色都不变；
我若被虎吃，
决不伤同伴。
死我何可惜，
自有擒虎汉。
壮烈九泉下，
瞑目笑开颜。

三

生来不是屈服汉，
哪怕而今家法严。
绞刑架上心不跳，
断头台上色不变。

四

唤起工农千百万，
信奉马列意志坚，
牺牲小我何可惜，
五殿阎罗闹翻天。

在歌乐山下的这场大屠杀中，我们发现仅有一次哀求记录：王振华、黎洁霜夫妇抱着两个孩子从白公馆被押向刑场。在生命最后一刻，他们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不约而同地把眼光转向手中抱着的两个孩子。此时的孩子在父母的怀抱中甜甜地在微笑，母亲黎洁霜那强压的泪水突然像涌泉一样，从眼中喷出，她声嘶力竭地大喊：孩子是无辜的！求求你们放过他们，求求你们饶了他们吧！父亲虽紧咬着牙，从眼光中却透出一种哀恳看着特务……。特务说：一个不留，斩草除根！丈夫王振华把妻子搀起来，紧紧地抱住。罪恶的枪响了，一家四口倒在了血泊中。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敌人的暴行已登峰造极，这仅有的一次哀求，实际上是对敌人最强烈的控诉，它极大震撼了我们的心。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王振华、黎洁霜烈士献出了他们的一切。

周从化将军的“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

车耀先烈士的“愿以我血献厚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何敬平烈士的“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

叶挺将军的“愿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是烈士对人的生命意义最高的认识。这，是烈士对人的生命价值最高的展示。当死亡逼近他们的时候，他们抱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信念从容大度地去直面死亡、蔑视死亡！任何凶残、任何威胁在他们的面前都是无用的。在死亡面前，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也没有任何的遗憾，新中国已经成立，敌人已注定要灭亡。完成历史使命和责任后的精神世界进入了一种极高的自由境界——无怨无悔地走向死亡！对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目标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使革命者产生了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的伟大精神气概，这种精神上的强大使他们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死亡的威胁在他们面前显得是苍白无力。

在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无数的革命儿女作出了牺牲，但是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里的革命志士最为悲壮，最让人痛心！因为在他们牺牲的那一刻新中国已经成立 57 天，距重庆的解放也仅有 3 天。

1949 年 11 月 27 日大屠杀那一天的晚上 8 点多钟，敌人在那阴沉的天空下的狰狞面孔，使革命者看到了死神的降临。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刘石泉、邓惠中等 24 人首先被押往松林坡杀害！死亡的气氛笼罩着渣滓洞监狱，每个革命者像钉了铁钉一样，死死地站在牢房的门口，为先行一步的战友送别。

我们坐穿了牢底，我们扭转了乾坤，我们死而无憾！

我们的血没有白流，我们目标已实现，我们死得其所！

“马上转移，要办移交”的嘶叫声，打破了渣滓洞监狱的宁静。没有哭泣、没有惊慌！难友们手拉着手相互鼓励；他们用眼光相

互交换胜利的微笑。政治犯从每一间牢房里被押出,集中到楼下的牢房里。

怀抱婴儿的妇女,想用自己全部的身体去保护孩子;

被搀扶的伤者都硬硬地挺着胸膛,毫无一点惧色;

戴着镣铐的紧握着双拳,高昂着头;

……

一声尖锐的哨声后,荷枪实弹的刽子手突然出现在渣滓洞院子里,当“开枪射击”命令狂叫时,刽子手们冲到每一间牢房门口,端着卡宾枪对着手无寸铁的政治犯一阵疯狂地扫射!在这突如其来的屠杀中,有的人立即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有的人大骂狗特务卑鄙下流!也有的人立即就地卧倒。就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三、五、六室的李泽、胡作霖、张学云、何雪松留下了他们生命中最为勇敢、最为壮烈的一组镜头:

27 岁的新四军排长李泽紧扑到牢门上,伸出双手死死抓住刽子手伸进风门的枪筒,意欲夺枪反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上身的数处,鲜血涌流,但他仍然不松手。他那双眼睛一动不动地死死地盯着刽子手。罪恶的子弹狂泻在他身上,他终于倒下去了……

脱险志士钟林回忆道:

“我的心里埋藏着最深沉的仇恨,但当时我却淡淡地没有太大的浮动,只平淡地意味到‘必死’,恐怕大多数的同志和我有着同样的心理变化,尽管在未开枪前,我们没有料到这无耻的屠杀,但在枪声响起以后,我们也并未因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而震惊,更没有恐惧,因为我们早有‘死是必然,生是假如’的必死的准备,所以战友的死并没有引起我的极度恐惧,也许是由于积愤太多的缘故吧。

再一阵笛声之后,枪声停止了。

但枪声忽然又从七、八室那头传来了,断断续续地又停了,我听到了门锁的响声,马上明白是依次进屋补枪,一种侥幸的心理没有了,这是大家共有的感觉。

歌声和口号声从六室那边响起来,我们室里也不约而同地唱着喊着,很快地,四室、三室那边也响起了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新中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

傅伯雍脱险后回忆道:

“……不过十多分钟,就听到枪声响了,这时大家都很紧张,各找各的地方,有的卧到地上,有的卧到床上,有的卧到床底下,当时我是卧到进门左边靠里面墙角的床底下,敌人先在门外用枪向室内扫射,过了一会儿,又开门向室内打了一阵枪,敌人又把门关上,接着又听到楼上的东西响,大约十多分钟后就没有听到声音了,这时只听到有人说火燃起来了,又听到门响的声音,这时我才慢慢地从床下爬出来,就看到门已开了,有一两个人很快跑到室外走道上,朝左边走道跑,我赶紧把鞋子穿好,跑出室外,沿左边走道往围墙处跑出去了,一直不停地跑,到天亮时跑到嘉陵江边,搭木船向合川方向走了,走了四五天才回家。”

1949 年 12 月 14 日重庆《新民报》第四版《蒙难烈士忠骸、收殓工作完毕——装棺的有 266 具》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渣滓洞一百二十五具,戴公祠九十九具,电台岚垭三十具,……”

1949 年 11 月 29 日,国民党反动派逃离重庆之际,对革命志士的血腥大屠杀结束了!

1949 年 11 月 30 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

当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他们没有去接受重庆人民载歌载舞的欢迎,而是急速地冲进歌乐山……

可是,歌乐山已是青烟焦土、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们,强压着夺眶欲出的泪水,脱下军帽,举起枪口,对着天空鸣放!这,是生者为死者的送行!这,是战友对战友的崇高敬意!这悲壮的枪声在空旷的歌乐山中回荡,惊天地,泣鬼神。

超越死亡——生命的存在,死亡的出现,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试图把生命个体的物质现象予以永恒的努力,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还没有成功的记录。生是物质运动的必然,死也是一种必然。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有的人不考虑它,也不存在恐惧,该